

12-1-2020

先秦諸子開幕式與閉幕式

Yi YANG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門大學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楊義 (2020)。先秦諸子開幕式與閉幕式。《嶺南學報》，第十三輯，頁215-229。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3/iss1/10

This 其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先秦諸子開幕式與閉幕式

楊 義

【摘要】孔子於魯昭公三十一年赴洛陽問禮於老聃，老聃傳授的道和禮，孔子接受並加以改造的以仁和孝為核心的禮，開啟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源頭。三百年後，荀子招收韓非、李斯為徒，以帝王術統率思想，給諸子百家爭鳴畫上一個句號。這就是先秦諸子百家的開幕式和閉幕式。

【關鍵詞】道 禮 仁 孝 開幕式與閉幕式

一、現代大國學術應該敢於 面對重大的關鍵問題

孔子到成周洛陽向老子問禮，這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和思想原創拉開帷幕的重大歷史性事件，由此展開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片耀眼奪目的神光。如今洛陽還有“孔子問禮處”的古建築遺存。然而，春秋戰國時期有兩次重要思想家的聚會：一次是春秋晚期，孔子到洛陽向老子問禮，這是啟動以後三百年中“百家爭鳴”的關鍵；另一次是戰國晚期，韓非和李斯拜荀子為師，這給三百年的“百家爭鳴”畫上了一個句號。這兩次聚會，可以看作諸子百家爭鳴的開幕式和閉幕式，把廣闊的中國大地變成了東方的“雅典學園”。但是不僅孔子何時會老子，而且荀子與韓非、李斯如何成為師生，以往都是陰影模糊或爭論不休的糊塗賬，都是尚未破解的千古之謎。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家拉斐爾因受任裝飾梵蒂岡使徒宮，而在1509年至1510年間創作了巨幅的《雅典學園》壁畫，描繪了57個思想家、科學家、文

學家、神學家，難道我們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後人，就疑神疑鬼、猥猥瑣瑣不能繪出那幅東方思想文化上黎明時分數量逾百的思想家的創世紀的壁畫嗎？

《論語》不載老孔會年代信息，《述而篇》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很難說指的是老子、彭祖之類，而應該排除古人一再重複的迷誤，確認指的是商朝初期的智者老彭，如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老彭，殷賢大夫。”這有《大戴禮記·虞戴德》作證：“（魯哀）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穿著褐色粗衣，懷抱美玉）也，行不越境。’”孔子親昵地稱呼他是“我殷人的老彭”，是別有深意的。既然《論語》“不載”老子，老彭與老聃無關，這就存在著材料整理上的裂縫，本身就是一種值得追問的編纂價值選擇。由於老聃職位不顯，孔子尚未為大夫，他們在春秋晚期的這次會面，沒有達到官方文獻同步記載的政治級別，就如孔子為中都宰，《春秋》、《左傳》均無記載，唯有當上魯司寇纔够級別一樣。這就給那些沒有考慮官方文獻內含價值選擇的疑古者，留下了質疑孔子是否確實見過老子的文獻裂縫。有疑古者甚至認為老子在莊子後，那麼孔子就無從見老子，所有戰國秦漢記述這兩位學術大老會面的文字都成了古人在作偽，由此留下了中國文明史上千古浩歎的一個“超級疑難”。幸好偉大的太史公不受漢代已經擡頭的“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的門派之見束縛，通過“絀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及實地調查所得，在《史記·孔子世家》及《老子韓非列傳》中以相當篇幅記述了此番文化盛事。如此獨具隻眼地為一些不見於先秦官方文獻記載的文化巨人立傳，太史公由此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功臣。

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事件，是不容閉目無睹的。源自戰國簡帛的《禮記·曾子問》、《莊子》、《呂氏春秋·當染》、《孔叢子·記義》、《韓詩外傳》，都言之鑿鑿地記有孔子問禮於老子之事。太史公之後的《新序》、《說苑·反質》、《潛夫論》、《論衡·龍虛》及《知實》、邊韶《老子銘》、《孔子家語·觀周》，多次提及“孔子師老聃”、“孔子觀周”或孔子曰“吾聞諸老聃”。這些材料雖然蕪雜，但多是錄自戰國秦漢簡帛，漢代祠堂墓穴畫像石、畫像磚也不乏對此事的展示。尤其是孔子自言“聞諸老聃”，《禮記·曾子問》四見，《孔子家語》四見，《白虎通義》一見，從不同角度洩露了孔子適周問禮、

問《易》、問五帝德與帝姓系於老子。一個歷史事件存在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如此繁多的古老材料，實屬罕見。其中當然存在著傳聞異辭，或流派偏見，但老孔會面是言之鑿鑿，並不因後來的聖人之徒為保護“道統之純粹”，就可以一筆勾銷。這就有必要深度綴合文獻材料碎片，溝通其內在的生命脈絡，從歷史編年學上確定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的年份，破解這個千年留存的“超級難題”，以便去妄存真地走近生機勃勃的歷史現場。

二、破解“老孔會”的超級難題

啟用史源學，考索史料的原本性、真確性、完整性、變異性，及其直接、間接的可能性，於此有正本清源的功能。《史記·孔子世家》以正史方式鄭重記載，孔子派南宮敬叔向魯君請准作為魯國特使適周問禮於老子：“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又記載：“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問題在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並沒有標示此事發生的年份，而《史記·孔子世家》將此事置於孔子年十七，孟僖子病且死，告誡其子嗣孟懿子及南宮敬叔師從孔子學禮之後，而居於“孔子蓋年三十”之前。其實南宮敬叔少孔子二十一歲，即便孔子三十歲，也不可能派一個九歲孩子向魯君請示。從史源學上考索，這是太史公誤用《左傳》魯昭公七年（前535年，孔子十七歲）的記載：“（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遺囑送“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其實，“病不能相禮”的“病”字，作擔憂解，指孟僖子因魯昭公參加楚靈王章華臺落成典禮歸國，擔憂不知使用何等禮儀。因為半年期，他作為相禮的副使（“介”），隨魯昭公經過鄭國到楚國，在鄭伯慰勞時及在楚國郊勞的場合，都不知道使用什麼禮節，對於這次辭楚歸國的禮節，只好請教知道禮儀的人以應急。但是，孟僖子死，是十七年後（魯昭公二十四年，前 518）的事情，這在《春秋》有明確記載。孟懿子、南宮敬叔是四年後，即魯昭公十一年孟僖子與泉丘女子私奔而生。孔子十七歲時，孟懿子、南宮敬叔還沒有出生。太史公一人著成如此大書，對《左傳》記載不夠清晰的歷史細節未及深究，未能將兩個相距十七年的事件明晰分疏，造成了孔子見老子年份的混亂。這一混亂被東漢桓帝時邊韶作《老子銘》坐實為大錯：“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學禮於老聃。”酈道元《水經注》卷一七沿襲此說：“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儘管這些都是周秦漢晉的古老材料，但其史源採用中已經出現以訛傳訛的錯誤。近世學者或以為唐以前碑刻和地理名著值得珍視，力主“孔子年十七問禮於老子”，這是史源學上的失察。

又添混亂的是《莊子》外篇·雜篇有六處記老孔會面問學，除了證明“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的莊子及其後學，知道歷史上曾經存在過“老孔會”，對孔子求學於老子津津樂道，以張揚“道為儒師”之外，其《天運篇》稱：“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眾所周知，孔子自稱“五十以學《易》”，“五十知天命”，《莊子》卻偏偏說“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顯然是對儒學的揶揄嘲諷，是以“重言”方式貶孔揚老，因而不可將其所講年歲當真，不然就可能陷入《莊子》所設的陷阱。更何況魯定公九年（西元前 501），孔子五十一歲出任中都宰，在很短時間就連升為司空、司寇。到了五十歲還是一介布衣的孔子，豈會放下公務，而南之沛問玄虛之道於老聃？後人無法彌合孔子見老聃之年份裂縫，只好說孔子多次見老聃，其實是並沒有繞開《莊子》布下的迷魂陣。

孔子見老子，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孔子賦閑有長途旅行的時間；二是孟僖子卒後，南宮敬叔拜孔子為師，孝期滿後得以隨行；三是據《禮記·曾子問》，這一年發生日食。這些條件清代學問家閻若璩多少是看到了，而且特別強調第三個條件，孔子隨老子參加一次出殯，遇上日食。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八云：“有以孔子適周之年來問者，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

是為定公九年。《水經注》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為昭公七年。《索隱》謂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于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為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案《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

應該承認，閻若璩講究證據，比莊子、邊韶向孔子見老子的歷史現場走近一步。但他的結論還存在著三重扞格：一是孟僖子卒年即魯昭公二十四年（前 518），南宮敬叔纔十三歲，孔子不可能指派如此年齡的少年去疏通魯君。二是南宮敬叔父喪於二月，南宮敬叔不可能隨孔子適周，五月見日食。《禮記·雜記下》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其時孟僖子尚未下葬，南宮敬叔豈能未盡孝就千里迢迢地隨孔子赴周？三是魯昭公二十四年，東周王室發生王子朝之亂，周敬王出奔狄泉，成周洛邑動盪不寧，孔子不可能乘亂適周。那樣既會危及孔子一行的性命，也可能找不到避亂的老子。

當代學人有關注魯昭公二十四年周室不寧者，遂以日食發生年份為著眼點，將孔子適周見老子，提前到周亂之前的昭公二十一年（前 525），這一年也有日食，如《春秋》魯昭公二十一年記載：“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但這種意見忽視了南宮敬叔此時僅九歲，尚未師事孔子，也就談不上其他與孔子適周的行爲了。而且這一年的日食發生在下午五點半左右，與周人出殯在上午的禮制不合。為何不將年份後推？因為他們考慮到此後“魯國無君”，似乎又關照到孔子讓南宮敬叔溝通魯君。《左傳》魯昭公二十五年（前 517）記載：魯昭公因季氏和郈氏鬥雞結怨，遂與郈氏發兵圍季氏，被三桓擊敗，流亡到齊、晉邊境，直至魯昭公三十二年，客死於乾侯。確實在這八年中，魯國存在著無君狀態。

關鍵是對於被季氏驅逐到國外的魯昭公，孔子還認不認他是魯君。很重要的一條材料，是《左傳》魯定西元年（前 509）記載：“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孔子為魯司寇是在九年後，即魯定公十年（前 500），如果他與魯昭公沒有深刻的認可和人事因緣，豈會拂逆大權在握的季氏，將已經遠葬的魯昭公重新開溝劃回魯公墓地的範圍中。《孔子家語·相魯》說得更清楚：“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可見孔子堅持周禮標準，對於被季氏驅逐的魯昭公，依然認可為國君，並指責季氏逐君貶君的行爲，為“非禮”。此舉拂逆了權傾魯國的

季氏,孔子如果與魯昭公沒有特殊的因緣,是很難如此果斷的。

進而言之,在對各家之說進行深入的史源學和文獻學辨析、勘謬和排查的基礎上,就可以確認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是在魯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孔子四十一歲,南宮敬叔二十歲。《春秋》該年記載:“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魯昭)公在乾侯。……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這一年,晉定公擬出兵護送魯昭公歸國,季氏也相當卑恭地到乾侯迎接昭公,即是說,魯昭公獲得國君禮節上的尊重,只因“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孔子應是此時派南宮敬叔向魯昭公請准,以魯國使者的名義而適周,由於魯昭公終不得歸魯,客死於晉國邊境的乾侯,依然是國君不君的狀態,所以不記載魯昭公的明確諡號,泛稱為“魯君”,此乃儒門常用的“春秋筆法”。

又由於魯昭公流亡在外,靠晉、齊周濟渡日,只能贈予“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這是相當寒磳的贈予,對於名人孔子和三桓子嗣南宮敬叔,正常國君起碼要贈予五輛、十輛車,甚至派武士隨行護衛。參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告辭,老子贈言:“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以一車、二馬、一豎子,風塵僕僕見老子,可能對國君有怨言,老子纔會有如此贈言。當然,人們也可以《逸禮·王度記》所云“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以孔子尚是未爲大夫的“士”,聊以塞責。但他既然請准爲魯國使者,應該有“准大夫”的禮儀。

三、人文與科技結合的研究手段

至爲關鍵者,孔子隨老子參加出殯時,遭遇日食。《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shān,瘡疾)患。’吾聞諸老聃云。”從這則記載“柩不蚤出,不暮宿”,可知周人出殯是在上午、中午之間。

《儀禮·既夕禮》記述入葬之日，“厥明，陳鼎五於門外”，舉行鄭重而簡單的祭奠哭踊禮儀之後，“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可知按照周制，葬禮是在上午舉行。因為葬禮之後還有虞祭，《禮記·檀弓下》云：“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疏曰：“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釋名·釋喪制》又云：“既葬，還祭于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既然將屍體下葬後，緊接著就有將靈魂迎回祖廟的虞祭之禮，必須在當日中午舉行，那麼孔子從老聃助葬途中所遇到的日食，應發生在上午 10 時左右，纔能符合周朝禮制。古人的葬禮必須遵從嚴格的禮制，如《孟子》所云：“喪祭從先祖。”這是不能隨意處置的。在這裏應該遵循“以禮解經”的原則。於此，不妨以現代天文學驗之，查《夏商周三代中國十三城可見日食表(食分食甚)》及 Five Millennium Canon of Solar Eclipses: -1999 to +3000 (2000 BCE to 3000 CE)，可知在洛陽可見的日食的準確時間是，魯昭公三十一年(前 511)周曆十二月初一(西曆 11 月 14 日)上午 9 點 56 分前後，按周制上午出殯，適遇日食。《春秋》用的是周曆，記載該年“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真確無誤的。向下推到魯定公五年(前 505)西曆 2 月 16 日下午 15 點 15 分前後也有日食，但按周制出殯，不能遭遇日食。

必須補充說明，之所以於此順帶提及魯定公五年，是爲了全面掃描從孔子 17 歲到他 52 歲當魯司寇、周游列國之前這 30 多年間的所有可能存在的時間縫隙，以便對孔子適周問禮的真實年限，作進一步的“無縫確認”。前面的分析，排除魯昭公三十一年以前的種種可能性之後，還要進而排除魯昭公三十一年以後的種種可能性，確認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只能發生在魯昭公三十一年唯一性。這是嚴密的研究必須下的功夫。南宮敬叔此年二十歲，在孟僖子卒後，他十三歲拜孔子爲師，三年孝滿，魯昭公已被季氏驅逐出境，他不可能如期繼承爲大夫，到魯定公繼位後，纔得以爲大夫。一任大夫，他就迅速露富。《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敬叔聞之，驟如孔子，而後循禮施散焉。”此記載得到《禮記·檀弓上》的印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以上言南宮敬叔之富，至於車馬，《孔子家語·致思篇》記載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鐘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貶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可見南宮敬叔爲大夫之後，車

馬甚多,如果此時魯君只贈予“一車二馬一豎子”,他是否領受就很難說。由此可知,孔子派南宮敬叔向魯君請准適周而發生的許多事情,不可能發生在南宮敬叔在魯定公初年為大夫之後。只能發生在魯昭公三十一年,南宮敬叔未為大夫,尚無車馬之資之時。

尚須注意者,魯昭公三十一年,東周洛邑政局略為安定。從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崩,周王室內亂,晉立敬王,居於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把持成周。直到魯昭公二十六年,周敬王纔在晉師的幫助下入主成周,王子朝奔楚。因而孔子不可能在魯昭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之間適周,而魯昭公三十一年孔子進入成周,則具有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他不可能帶著一個二十歲的貴族弟子和一個“豎子”,駕著二馬拉的軺車,(漢畫像石呈現的是軺車,輕便的四向遠望的小馬車,如《史記·季布列傳》云:“乃乘軺車之洛陽。”《漢書·平帝本紀》云:“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闖進戰火紛飛的險地,必然等到戰禍遠去之後纔到成周訪學。

然而,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之事,為何在《論語》中是缺席失載的?《論語》在眾弟子為孔子廬墓守心孝的最初編纂中,遵循嚴格的價值標準,對眾弟子憶述的材料作了論衡、取捨、潤色的處理,而留下編纂者認為最符合他們所理解的“真孔子”的條目。因而並非《論語》不載者,歷史上就不存在,比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這樁儒門大事,《論語》就隻字不提。至於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眾弟子中只有南宮敬叔隨行,而南宮敬叔的材料,《論語》並無採納。儘管《公冶長篇》記述:“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朱熹注:“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但從孔子對南容品行的嘉許,及對三桓子弟南宮敬叔的稱揚和貶責來看,二者與孔子的關係不可同日而語,並非同一人。南宮敬叔在《論語》編纂中並無話語權,《論語》也言不及老子,這都是編纂者遵循顏回、曾子路線理解“真孔子”所致,並非《論語》不載者,歷史上就不存在,大量的戰國秦漢文獻及出土簡帛已經證明這一點。對於文獻記述與歷史存在的關係,我們應該心存幾分辯證思維,切不可落入清人毛奇齡所嘲諷的:“六經無髭髯字,將謂漢後人始生髭髯,此笑話矣。”漢以前的人有無鬍子,與掌有文獻記載權力的人是否注意到它,是否記載它,這並不是一回事。只有進行如此全息性的研究,

包括孔子及南宮敬叔的生命信息，魯國政治中之魯君流亡和周室動亂平息的信息，古代天文學信息，及周人喪禮信息，在學術方法高度綜合中嚴密地進行排除和聚焦，辨析和綴合，最終加以編年學定位，纔可能廓清先秦諸子開幕期的老孔會面這個千古之謎。由此考定，老孔會發生在魯昭公三十一年(前 511)周曆十二月初一見日食之前後，這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開幕式。

四、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閉幕式

春秋戰國時期有兩次重要思想家的聚會：前面所講的一次是春秋晚期，孔子到洛陽向老子問禮，這是啟動以後三百年中“百家爭鳴”和思想原創的關鍵；後面要講的另一次是戰國晚期，韓非和李斯拜荀子為師，這給三百年的“百家爭鳴”畫上了一個句號。這兩次聚會，可以看作諸子百家爭鳴的開幕式和閉幕式，把廣闊的中國大地變成了先秦諸子爭鳴和思想原創的東方的“雅典學園”。如果以這個開幕式和閉幕式為框架，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可以列舉百人以上，數量大於古希臘的“雅典學園”一倍以上。但是不僅孔子何時問禮於老子，而且荀子與韓非、李斯如何成為師生，以往都是爭論不休的糊塗賬，或者是尚未破解的千古之謎。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李斯列傳》記載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于荀卿。”那麼，韓非、李斯是多大大年紀、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當了多少年荀子的學生呢？二千年來，人們找不出材料加以證明。戰國晚期三大思想巨擘聚首於楚，乃是思想史上大事，有必要恢復它的歷史現場。

梳理荀子生平，他五十歲在齊襄王時代纔游學稷下學宮，“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在孟、莊之後已是首屈一指的思想學術大家。其間他曾游秦見應侯與秦昭王，不能說他無意於用秦。《荀子·強國篇》記述秦相“應侯問孫卿子”；《儒效篇》記述秦昭王與荀卿答問；《新序·雜事第五》又記載“秦昭王問孫卿”，都透露了他曾經幹謁秦國最高當局，時間約在齊王建八年(前 257, 秦昭王五十年)前後。由此他在稷下受讒，為楚春申君聘為蘭陵令，時在春申君相楚八年(前 255)。荀子在楚又受冷箭，辭楚歸趙，再應春

申君招請,已是兩年後了。此時荀子作《癘憐王》之書,以答謝春申君,見於《戰國策·楚策四》,而《韓非子·奸劫弑臣篇》也收錄此文。一個令人迷惑不解而長期引起紛爭的問題是:此文的著作權屬誰?過去人們糾纏於一真一偽的簡單思維,老虎咬天,無從下口,令人想到邯鄲淳《笑林》有“執竿入城”的笑話,說:“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關鍵在於知道“轉身”,一經轉身,問題就迎刃而解,魯人的長竿就可以通過城門,直達城池的深處。如果考慮到荀、韓之間的師生關係,《癘憐王》的著作權就有三種可能的解釋:一是韓非所作,《戰國策》把它誤安在荀子的名下;二是韓非抄錄老師文稿,而混入自己的存稿中;三是荀子授意門下弟子韓非捉筆,而弟子有意保存底稿,留下一個歷史痕跡,而荀子修改後將它寄出。仔細比較《戰國策·楚策》和《韓非子·奸劫弑臣篇》略有文字差異的《癘憐王》文本,覺得上述第三種解釋較為合理。原因有五:

一是《楚策》本比《韓非子》本刪去一些蕪詞,文字更為簡潔。而且改動了一些明顯帶法家傾向的用語。將“人主無法術以禦其臣,雖年長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改成“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改掉了“禦其臣”、“得勢、擅事”等法家慣用詞語。

二是《楚策》本在修改《韓非子》本時,增加了“春秋筆法”。把“劫殺死亡之主”、“劫殺死亡之君”中的“殺”字都改作“弑”字,把弑齊莊公之崔杼稱“崔子”的四處刪去二處,改為直稱其名“崔杼”。這些都可以看作起草者有法家傾向,改定者為儒家老師,精通“春秋筆法”。

三是文中採用的一些歷史事件為荀子熟知,而對韓非而言並非直接的材料,當是老師口授,弟子筆錄的。比如李兌在趙國掌權,圍困沙丘百日,餓死主父(趙武靈王),乃荀子青年時代在趙國所知。尤其是淖齒在齊國受到重用,竟把齊閔王的筋挑出懸在廟梁上,使他宿夕而死。此事發生在荀子到稷下之前幾年,此前未見史載,當是荀子初到稷下所聽到的宮廷秘聞。這對於荀子是第一手見聞,對於韓非是第二手材料,說明此文經過荀子口授。

四是本文用“癘憐王”的諺語作主題,乃是儒家的命題,而非法家的命題。《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刊本《戰國策》鮑注:“癘(癩也)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也就是說,當國王比起生惡疾,還要難受,還要危險。

只有儒家想當王者師，纔會如此說三道四；法家是王之爪牙，甚至國王“頭頂生瘡，腳下流膿”，也要當國王的狗皮藥膏。這樣的主題豈是崇尚君王權威的韓非所敢說、所能說。實在是老師大儒如荀子，方能出此狂傲之言。

五是《楚策》此文之後，還增加了一篇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又引《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賦爲荀子創造的文體，引《詩》述志是儒者包括荀子常用的手法。因此，當都是荀子改定時所加。這五條理由可以證得，這篇《癘憐王》的答謝書，是一篇由荀子授意，韓非捉筆，最後由荀子改定寄出的文章。

過去有學者想證明《癘憐王》的《韓非子》本與《戰國策》本，一真一僞，其實這兩個文本都是真的，只是過程中的真，不同層面的真。頑固的真僞之辨，應該轉換爲深入的原委剖析，纔可以打破研究的僵局。《韓非子》中的文本，是被授意起草時的真；《戰國策》的文本，是改定後寄出時的真。真所謂“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判決狐疑的方法，是要轉變思想方法，如實地承認萬事萬物存在的多種可能性，而不是一條筋到底的一種可能性。

劉向編纂《戰國策》以前百餘年，韓嬰的《韓詩外傳》卷四就指認這篇“癘憐王”是荀子所作。《韓詩外傳》說：“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荀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借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僞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非比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走出，逾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臃腫

痲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痲矣。由此觀之,痲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旋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媼子都莫之媒,媼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惱,無自瘵(zhài,多指癆病)焉。’”

如果以上材料對荀子委託韓非捉刀而後自行修訂寄出的考證可以相信的話,一系列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荀子由趙取道於韓,準備到楚都陳郢應春申君再次聘請時,韓非已在荀子門下,他們結緣於韓國首都新鄭,時在前 253 年;李斯在六年後,即秦莊襄王卒年(前 247),辭別荀子離楚入秦,由呂不韋的舉薦而爲秦王政所用。即是說,韓非、李斯師事荀子,共計六年,前 253 年至前 247 年。此時荀子六十多歲,韓非四十多歲,李斯二十餘歲。其時楚國首都已遷至東北的陳城(或稱陳郢,今河南淮陽縣),他們聚首的地方是在楚國的新都陳郢,其地離韓都新鄭和李斯故鄉上蔡都在二三百里路程之內,交通頗便。

那麼,他們師徒相聚的方式何如?李斯年僅二十餘,正是從師問學的年齡,較爲經常在荀子身邊。這又爲《荀子》書中李斯、荀子的問答所證實。《荀子·議兵篇》:“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云云。《荀子·強國篇》楊倞注引李斯問荀卿曰:“當今之時,爲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李斯進入秦國之前,《史記·李斯列傳》又記載李斯向荀子告別請教:“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因此,二十餘歲的李斯是經常隨師請教的。韓非從師的方式與李斯有明顯的差異。韓非年逾四十,又是韓王之弟,屬於政治上相當敏感的人物,必須常住韓都,經營當官進入樞要的機會,不然就可能長久被邊緣化。他們師生相處的時間並不長。韓非未必常在身邊,而且韓非師事荀子時,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法術家或思想家,因而荀子對他的影響不是體系性的,而是智慧性。並且荀子是三晉之儒,異於鄒魯之儒,出禮入法,在稷下十餘年浸染了某些黃老道術及其他學派的學術。比如作爲齊國稷下學派文匯的《管子》成分就相當複雜,《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道家,屬於“知乘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之學派;《隋書·經籍志》把它列入法家。稷下學術的混雜狀況,當然爲荀子所取材。荀子由此增強了提倡君主“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荀子·王霸篇》)

的威權專制的政治取向，他人秦觀風俗吏治，交接秦相應侯，不排除有幾分用秦之心，授徒也用帝王之術。因此在這些方面與韓非並不隔膜，反而深化了對韓非的“歸本于黃老”認識。這樣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解開儒家宗師荀子，為何培養出兩個法家巨擘的秘密了。一是因為韓非已是成熟的法家；二是因為他們的師生關係發生在荀子長期當稷下祭酒之後。

荀子致春申君的《癘憐王》一函的深刻在於它對“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的春申君的命運，做了令人不寒而慄的預示。如《史記·春申君列傳》記述：“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原指秦宮門。古代帝王外出，在止宿處插戟爲門，

稱“棘門”。棘,通“戟”)之內。春申君入棘門,(李)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隨之古典學研究的深入和問題意識的增強,諸子迷津,觸目皆是。深刻的古典學研究,於此大有作為。先秦諸子與我們遠隔二千餘年,許多材料蒙上厚厚的歷史煙塵,專題探討又遭遇了材料的有限性、甚至碎片化的困境,釐清一些歷史謎團談何容易,簡直就如《詩經》所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但先秦諸子又是我們的文化根子所在,不渡過迷津,就難以到達我們文化發生的原本。迎難而上,勉力而為,也許就是我們的返本還原研究的宿命。本人的《老子還原》、《莊子還原》、《墨子還原》、《韓非子還原》著手破解的千古疑難就有 38 個,正在撰寫的《論語還原》所要破解的千古疑難為數更是可觀。每破解一個千古之謎,我們就向諸子的原本生命和真實本質,走近了一步。經過這番返本還原研究,我們就可以用熟悉的、真確的、甚至親切的姿態,與先秦諸子進行深度的文化對話,追問他們為我們民族注入何種智慧,他們在創立思想時有何種喜怒憂愁,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發展中他們提供的思想智慧有何種是非得失,在現代大國文化建設上這些古老的思想智慧如何革新重生。這種文化解釋能力,是與現代大國安身立命的根基聯繫在一起的。誠如《淮南子·泰族訓》所云:“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或如《晉書》所云:“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這是人文學者追求的文化自覺應有的要義之一。又有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既然經過返本還原研究,與先秦諸子機鋒相投,那就會有說不完的心裏話。在人生路上,或者國家發展的進程中,無論風雪雨晴,都有一批高智慧的聖賢時時光臨你的心靈,這將是為人在世享受不盡的莫大福分。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澳門大學)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Yi Yang

In the 31st year of the Duke Zhao of Lu, Confucius went to Luoyang and consulted Laozi about *li* 禮 (ritual). Confucius re-conceptualized *li* with *ren* 仁 (benevolence) and *xiao* 孝 (familial piety) as the cores. The exchange between Confucius and Laozi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Three hundred years later, Xunzi mentored Han Fei and Li Si and taught them the art of rulership which puts an end to the centuries-long Contention. Such are its beginning and end.

Keywords: *Dao*, ritual, benevolence, familial piety, beginning, end